

担心与启示：朱光潜晚年维柯研究发微

钟仕伦

在西方美学家中,还没有那一位美学家像维柯那样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到 80 年代对朱光潜的学术生涯产生过如此长久而深刻的影响,也还没有哪一位西方美学家像维柯那样在朱光潜的晚年受到如此多的关注和研究。朱光潜为什么对维柯如此倾心?为何要在耄耋之年克服病痛,以顽强的毅力全译出维柯的《新科学》,其中的原因何在?或者如有的学者所言,他在担心什么?本文拟对此做初步探寻,试图发现朱光潜晚年维柯研究的意义及其对中国美学的某些启示。

—

朱光潜对维柯的接受始于上个世纪的 20 年代。他自己说:“我在美学上的发展是以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为基础的。到了 20 年代,我到西方留学时,才接触到维柯和他的学生克罗齐。”⁽¹⁾通过抗战时期完成的克罗齐哲学和美学研究,朱光潜发现,要想进一步研究克罗齐,特别是克罗齐“直觉说”与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之间的关系,不对维柯的思想进行系统的研究,很难达到这个目标。经过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他更加意识到维柯思想的重要性,“维柯所提的那个问题(认识真理凭构造或创造——引者注),美呀,艺术呀,或者思想都是创造性的。我久经思考,越来越觉得只有这个观点有道理”⁽²⁾。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之后,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中专门列了一章来评介维柯的美学思想。但是,由于朱光潜当时尚未获得全本的英译《新科学》,只能根据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1948 年出版、由伯尔金(T.G.Bergin)和费契(M.H.Fisch)英译的《新科学》的片段来介绍和分析维柯的思想,再加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导意识形态的决定和高校教材的特殊性要求,朱光潜对维柯的评价并不全面,具有“片面性”⁽³⁾。

80 年代初,在翻译《新科学》的这段时间,朱光潜接连发表了数篇有关维柯的论文。1981 年 12 月,朱光潜在《国外文学》第四期发表《维柯的〈新科学〉简介》说,“维柯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他创建了社会科学,而且在他创建了社会科学方面的历史发展观点”⁽⁴⁾。从朱

光潜引用马克思《巴黎手稿》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来证明维柯历史发展观的正确性来看,此时的朱光潜已经发现了维柯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⁵⁾尤其是朱光潜阐明的马克思实践认识论和唯物主义历史发展观与维柯“认识来自于实践”和“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之间的传承关系,对中国实践论美学思潮的形成起到了导乎先路的作用,也反映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熟练掌握和具体运用。这篇论文较之《西方美学史》最明显的地方就是,朱光潜明确提出了维柯《新科学》“全都可以看作把历史发展的观点应用于美学”和《新科学》的“基本原理是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分别和关系,也就是诗和哲学的分别和关系”的观点。⁽⁶⁾

1983 年 6 月译完《新科学》以后,当年的寒假,朱光潜撰写了《维柯的〈新科学〉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 1984 年发表,这是朱光潜对维柯及其《新科学》的总结性的评价。⁽⁷⁾这篇论文显然与 20 年前的《西方美学史》不一样,后者带有机械地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痕迹,特别是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倡的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为文艺评价唯一标准的痕迹,如把“美的本质”归结为人民的价值观念显然与维柯论“美的本质”有所不同。

朱光潜开始全译《新科学》之时,正是真理标准大讨论,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之日。受这种时代思潮的影响,朱光潜对维柯的认识有了新的变化。他认为,与伽利略相比,“维柯的《新科学》却是范围更广大的包括自然科学主要是历史科学或社会科学的一门崭新的研究”。维柯的方法“改用培根所倡导的从搜集感性经验和客观事实加以分析综合而得出结论的批判法”。朱光潜发现了维柯《新科学》的人类学价值,将《新科学》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相提并论,认为维柯与摩尔根“这两人都是使人类学成为科学的先驱”,但维柯“在思想体系上终胜一筹”。同时提醒读者将《新科学》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比较起来研究。他指出,《新科学》“其实

就是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所预见到的‘人学’,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的观点。⁽⁸⁾此外,对《新科学》的宗教思想、阶级斗争观点、历史发展的观点等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特别是有关维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的分析奠定了中国实践论美学的哲学基础。朱光潜的这些新看法弥补了《西方美学史》的缺陷。

除了维柯的《〈新科学〉》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外,朱光潜在翻译《新科学》期间所写的文章中,例如在《中国古典美学简介》《形象思维:从认识角度和实践角度来看》《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言论概述》等文章,以及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Ⅱ》所写的“维柯”条目中,多次提到维柯的《新科学》在西方美学史上的地位和对美学发展的作用。而朱光潜结合 80 年代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和异化、文艺界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所做的维柯美学思想的分析,对当代美学关注人的本质和人的全面发展、“美学就是人学”等观点的提出也起到了引领的作用。

二

朱光潜翻译《新科学》的时,为了帮助读者通畅地阅读和准确地理解《新科学》的内容加了很多注释。这些注释由“名词术语和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解释”“对维柯基本观点的分析评价”和“用中国古代哲学、宗教、语言、美学、文学、艺术来比较维柯的观点”三大类组成。第一类是学术名著翻译的通例,以帮助读者通畅地阅读,这里不论。第二类和第三类是朱光潜维柯研究的另类范式,特别是第三类注释,可能是朱光潜翻译西方美学名著的注释中运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和美学思想术语比较多的一部,这是我们探寻朱光潜晚年维柯研究的宝贵资源,或者说是我们了解朱光潜晚年的担心与启示的一扇窗口。以下试做分析。

先说“对维柯基本观点的分析评价”。维柯认为,“民族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它的面貌必然要在人类心智本身的种种变化中找出。如果谁创造历史也就由谁叙述历史,这种历史就最确凿可凭了。……认识和创造就同是一回事”。朱光潜注释说:“这是维柯的一个基本的哲学原理,即知与行或认识与实践的统一,人类世界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这一点要牢牢地掌握住,才会理解‘新科学’。”⁽⁹⁾对维柯“语言

学家和哲学家需要相互请教”的注释说:“《新科学》一方面根据语言学来研究历史发展的凭证,另一方面又根据哲学来得出历史发展的真理,这就是史与论的结合”⁽¹⁰⁾。这个注释将《新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揭示出来,让我们了解到受启蒙主义影响的维柯的思想渊源。又如,对维柯有关“诗性语句和哲学语句”的分别的注释认为,“维柯把形象思维先于抽象思维、不能混同而各有各的功用的道理说得很清楚”⁽¹¹⁾。

在维柯“希腊人于是凭他们自己的性格来判定他们的神也和他们自己一样放肆邪侈了”这段话后,朱光潜提醒道:“注意:维柯在费尔巴哈之前就已提出神是人按自己的本性创造出来的这一重要学说。维柯实际上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不敢触犯天主教的忌讳,特地标明他所说的只限于异教民族,不包括希伯来人在内,仿佛希伯来人的《旧约》中神创造世界说还是实话”⁽¹²⁾。从这个注释可以看出,朱光潜已经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有了准确的掌握。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朱光潜正在撰写《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译文的商榷》一文,他对维柯先于费尔巴哈提出“神是人创造出来”的评价应该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评价相关联,二者有内在的一致性。又如,朱光潜对维柯“此外我们感到有一种自由,对一切依存于身体的事物在思索到它们时就在制造出它们。也就是说,我们从思索到它们,就是在一定时间内制造出它们,把它们完全容纳到我们本身之内”这段话注释说:“这是维柯所强调的‘认识凭创造’的基本原则。”⁽¹³⁾这些注释不仅对我们了解维柯《新科学》的思想观点有所帮助,而且让我们感觉到,这个时候的朱光潜已经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方法和立场——实际上马克思实践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建也与维柯的思想紧密相联——来研究维柯,对维柯进行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评价。

朱光潜在翻译黑格尔《美学》时也加了一些注释,这些注释主要由“较难章节的释义和提要”“点明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值得注意的一些问题”和“词汇和典故的简介”这三个方面组成,⁽¹⁴⁾偶尔也会用中国古代美学注释黑格尔《美学》中的概念,例如用“对屈原作品中美人香草之类的评释”来注解“抽象的知解力特别容易倾向于找象征和寓意”⁽¹⁵⁾;用“水似眼波横,山似眉峰聚”“人比黄花瘦”和“红杏枝头春意闹”“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来解释“显喻”(Gleichnis, Simile)和“隐喻”(Metapher)⁽¹⁶⁾。但是在维柯《新科学》的翻译中,朱光潜

却用了大量的中国古代的名词术语,包括经史子集、神话故事、巫术占卜、历史传说、典章制度、民间文艺、戏剧小说、民间习俗等,来注释《新科学》中的概念、命题、范畴和观点。这些注释所涉及的学科领域几乎可以和维柯《新科学》涵盖的学科内容相媲美⁽¹⁷⁾。这里仅就涉及中国古代哲学、美学、文学、艺术的注释做简要的分析。在这一类注释中,除了比较客观地用汉语词汇对应解释《新科学》相同、相近、相关的词汇以外,大致有以下几种方法。

一是用中国古代文化来证明维柯观点的正确性。在对维柯“赫西阿德有可能比荷马还早,因为他的作品包括了全部关于诸天神的神话故事”的注释中,朱光潜说,赫西阿德“是《神谱》的作者,他对世界的起源和诸天神的世系叙述和荷马所叙述的也有些不同。他的另一部名著是《劳动和日期》,颇似中国的《月令》”⁽¹⁸⁾;维柯说,“(据传说)荷马很穷,在希腊各地市场上流浪,歌唱自己的诗篇”,朱光潜用“我国过去说书人和算命先生以及瞽妓也大半既穷而又盲目,流浪集市卖技,也可作为旁证”来加以印证;⁽¹⁹⁾他认为维柯提到的“赛里阿”(salio)的原意“也正如我国少数民族‘跳月’‘跳秧歌’之类歌舞”⁽²⁰⁾;对维柯“当时司祭们是唯一的识字人,只作出宗教性的颂神歌”的说法,朱光潜说:“中国过去的巫师也是如此”⁽²¹⁾;他甚至以“中国站装气功对踵的重视”来对应维柯“阿喀琉斯把他的命运寄托在他的踵上,因为他的命运或生死气数就站在踵上”的看法。⁽²²⁾

二是用中国文学艺术作品来比较《新科学》提到的作品。维柯认为,“和世界一切其他民族都隔绝的一些野蛮民族,例如日耳曼人和美洲印第安人,都已被发现把他们的历史保存在诗篇里”,朱光潜对此注释说:“中国的《诗经》和《楚辞》也可以为证”⁽²³⁾;对维柯阐释“决斗”的起源及其性质注释道:“中国历史特别是小说中也曾有将领身先士卒与敌方将领进行决斗的事例。”⁽²⁴⁾对维柯“人身(persona)的正确意义就是一种面具(mask)”中的“人身”作注说:“persona,即中国戏剧中的‘角色’。”⁽²⁵⁾当维柯论述到典型英雄人物之美时,朱光潜注释道:“就像凭阿喀琉斯和攸里赛斯来理解希腊社会习俗,在我国曹操和诸葛亮、李逵和宋江、薛宝钗和林黛玉等著名角色也起着同样的作用。”⁽²⁶⁾他还用《清明上河图》来解读维柯举到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两面盾牌上描绘的节日活动。⁽²⁷⁾

三是用中国的历史典章制度来解释《新科学》提到的政体性质和结构。维柯说,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们

通常叫作“人民的牧人”,朱光潜注释道:“汉语‘牧民者’和‘州牧’也是如此”“中国古代也把掌管民政权的首领比作牧民,一州之长就叫‘州牧’”⁽²⁸⁾;在注释维柯所引波丹提到的“麦罗文津朝代”的政体性质时,朱光潜说,“政体或宪法结构与政府或国政管理之间的区别是维柯经常指出的,拿中国近代史打比,北洋军阀时代政体是共和国,政府管理方式却是军阀专政”⁽²⁹⁾。他又以分年纪事史《竹书纪年》《春秋》《资治通鉴》来解释维柯提到的“时历”(chronology)这个概念;⁽³⁰⁾用中国古代的祭祀建筑“社稷”“坛”和“堡”的起源和作用来阐释维柯关于英雄城市的称呼和描绘。⁽³¹⁾

以上是有关中国古代文化的《新科学》的译注分析,现在讨论《新科学》译注的另一个特点,即结合当下的学术热点问题来阐释维柯的思想。举三个例子:

维柯在论证天帝约夫是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开始的动因或动力(conatus)时说,“因为看来象是物体中的动力仍不过是一种不可感觉的运动,……从这种努力就产生了以亚波罗为象征的文明的光辉,凭这种文明光辉就辨认出英雄们之所以成为美的那种文明的美。女爱神维纳斯(Venus)就象征这种文明的美。后来物理学们把这种文明的美看作自然的美,甚至看作全部成形的自然的美”,朱光潜在这里加注说:“这是‘自然美’的起源。”⁽³²⁾我们知道,上个世纪80年代初,“自然美”的问题是当时讨论得最多、争论最激烈的美学问题之一。朱光潜在这里肯定了维柯的观点,即“自然美”不是脱离人的意识的美,是人的实践认识的一部分。这是第一个例证。

第二个例证是对“形象思维”的注释。维柯通过各民族语言、历史、宗教阐述了人类思维从形象思维过渡到抽象思维的规律,以及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的不同特点及其相互关系的看法对朱光潜有着持久的影响,早在《西方美学史》中,朱光潜就给维柯的这个观点以积极的评价。晚年全译《新科学》时,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始终是朱光潜关注的重点。他给维柯“当记住事物时就是记忆,当改变或摹仿时就是想象”的观点作注说:“这里所说的想象,imagination或fantasie就是我们近来争论的‘形象思维’,维柯认为在人类心理功能发展中形象思维先于抽象思维。”⁽³³⁾在给维柯“玄学飞向共相,而诗的功能却要深深地沉浸到殊相里去”作注又说:“共相是抽象的共同属性,殊相是个别具体事物的形象。”⁽³⁴⁾这种紧密结合现实热点理论问题注释《新科学》的做法

反映出朱光潜一贯秉持的学术精神,即走出书斋,以自己的学术为社会、为大众、为实践服务。就像他 40 年前在抗战文艺论争中所坚持的学术操守一样,在《新科学》的翻译中,他通过注释维柯的理论观点来表达他自己的见解,以译注来参加当前的学术论争。

第三个是对维柯“认识来源于实践”的观点的注释。在对《新科学》“柏拉图创建出一种以理念(idea)起建筑作用、以德性或公道为基础的伦理哲学”中的“idea”作注时,朱光潜说:“这就是唯物主义(materialism)和唯理主义或客观唯心主义(idealism)的分别。”⁽³⁵⁾朱光潜认为,“维柯同时强调的尽管认识真理凭创造,客观的永恒真理还是不随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里所争论的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争论的‘唯心与唯物’的问题。维柯认为‘理式’(idea)是客观永远存在的永恒真理。后来人们把 idea 这个词了解成为‘唯心主义’的货色,于是在哲学史上就造成两千多年来的不断的争论”⁽³⁶⁾。

新中国成立以来,围绕美的本质、自然美、人性论、人道主义、阶级性等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可能是当代中国美学史上的绝无仅有的现象。通过上面的译注,我们可以看出,朱光潜对此身有所感,作为被别人“赐予”而自己不得不“认同”的“唯心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他一方面自觉地接受来自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批评,一方面又坚持他一贯的独立思考的学术品格,坚持对自己的美学思想进行认真的反思,科学地研读马克思主义原典,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从而不断修正自己的美学观点。他对《新科学》的注释和研究从来没有从权威理论出发,而是实事求是地、具体地从《新科学》的历史语境和社会语境出发来进行阐释和评价。

翻译学家奈达说,“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Nida 1993:152)”⁽³⁷⁾。朱光潜对中外文化,特别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掌握可谓烂熟于心,而其运用又如水中之盐,不落痕迹。他用中国古代各个学科的知识,包括民间传说、说唱曲艺、地方戏剧、医学养生的知识来为美学研究所运用也是其他人难以企及的高峰。这种广博的知识不仅来自于朱光潜对中外文献的掌握,而且来源于他丰富而坎坷的人生经历。

许理和认为,魏晋时期佛教的翻译,促进了早期中国佛教的形成和哲学思想的变化。⁽³⁸⁾王国维也以魏晋

佛教的引入为例,力倡西来之“美学”进入学界,以救中国“无学之患”⁽³⁹⁾。朱光潜翻译《新科学》时,遭受“文革”祸害的中国学界也正面临着“无学之患”。与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以“近代现代美学为主”不同,朱光潜《新科学》的翻译不仅以“格义”的方法将本质上为“异质文化”的维柯的美学思想引进中国,而且以“闲话”的形式对维柯的思想进行阐释。也就是说,《新科学》的译注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翻译注释,本身就是对《新科学》的研究。特别是引用中国古代文化知识来注释,已创造出一种新的美学研究的方法。有人把朱光潜的这种概括为“译介法”,认为朱光潜晚年“埋头于资料性的收集、整理和介绍上,对维柯《新科学》的潜心译介终成为一种绝唱”⁽⁴⁰⁾,这种看法似有一定道理。但如果就朱光潜大量运用中国古代文化知识来注释《新科学》看,这种方法也可以概括为“以中释西”的方法,即用中国古代已有的哲学宗教、历史文化和文学艺术等概念术语、思想观念,结合中国美学论争来阐释《新科学》的思想的方法。

从另一个角度说,朱光潜在译注中采用这样多的中国古代文化术语知识固然与维柯《新科学》本身所涉及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甚至还有自然科学的内容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朱光潜似乎有一种意图,想在这种注释中将 80 年代“美学热”所带来的中国古代美学研究推向前进。朱光潜有着醇厚深广的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和美学哲学的修养。在初进大学的时候,他“读得最多的是两汉以前的著作。……从那时到现在(1942 年 9 月——引者注),20 多年间我也还不断地翻旧书看,我也很明了群经诸子与楚辞汉赋的文章真茂美”⁽⁴¹⁾。在翻译《新科学》同时期所撰写的《中国古代美学简介》中,朱光潜就引用了《新科学》译注的内容。《中国古代美学简介》中有这样一段话:“西方从意大利维柯到克罗齐一派美学史家都认为语言文字本身就是艺术品,所以美学和语言文字学分不开。这种看法从中国汉语文字的产生和演变可以获得充分的例证。汉朝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序言里,把汉语文字分为象形、形声、指事、会意、转注和假借六类,即所谓‘六书’,其中前四类都是形象思维的产品。现在世界各国语言文字大半属于拼音系统,中国汉语文字几乎是极少数象形系统的文字中到现在还广泛运用的唯一的一种,因此就成了研究原始民族运用形象思维来创造文字的珍贵资料。”⁽⁴²⁾而这一段话的基本意思在《新科学》

译注中也出现过。维柯不止一次提到中国的象形文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⁴³⁾他在分析诗性逻辑中的“歌唱”和语言的关系时说：“拿中国人来说，中国土俗语言只有三百个可发音的元音词，它们在音高和音长上有各种不同的变化，来配上他们的一万二千个象形文字，因此他们是用歌唱来说话。”朱光潜在“它们在音高和音长上有各种不同的变化”这一段话后面加了一个注释：“指平上去入。”⁽⁴⁴⁾

因此，我们有理由说，朱光潜不仅通过译注来研究维柯，而且也通过译注运用维柯的理论观点来讨论中国古代美学和“美学热”所带来的学术问题，这是朱光潜维柯研究的另类范式，其中蕴藏着他的担心，也有深刻的启示。

三

朱光潜为什么要在垂暮之年克服种种困难，排除干扰，“决心戒写应酬文”来翻译和研究《新科学》？⁽⁴⁵⁾除了他自己所说的，因为研究克罗齐，所以要对维柯有所了解，而了解维柯最好的方法就是全译他的《新科学》，从而弥补当年的“缺陷”的原因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已近人生暮年，一位终身研究美学的老人为什么不去忙着整理出版自己的文集，而是去做翻译这类费力不讨好的事？难道这是朱光潜晚年“唯一的选择”？⁽⁴⁶⁾或者如有的学者所说，是他一贯坚持的“把翻译与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学术路径”⁽⁴⁷⁾的延伸，还是“翻译这本对近代西方文化和中国美学界有着巨大影响的书，是为后人的研究做些准备工作”⁽⁴⁸⁾？这些问题随着朱光潜的辞世，已经成为历史之谜，我们只能从朱光潜翻译《新科学》的本身来寻找其中的蛛丝马迹。

赵复三对朱光潜“晚年倾注很大心血”翻译维柯的《新科学》表示了崇高的敬意而又满怀遗憾：“朱先生以宝贵的余年，放下自己的著述，从事‘五四’以来，在中国学术界不受重视的译书工作，而且不翻译自己熟悉的西方美学领域的名著，却拣选了这本二百多年前人文学科开始受到注意时的书进行译述，其间必有深意；却未读到此书，故此未见到朱先生的详细解释。”他认为，80年代初的中国，在思想上还没有走出19世纪，“中国的思想者们，是不是在重新思考19到20世纪的历史？首先是有没有这种思考的勇气？如康德在《什么是启蒙》？那篇短文所说：‘启蒙就是敢于发问！’其次，是不是能脱出19世纪西方思想的窠臼，从更根本的源头去

探索人类走过的历史道路，剖析他们在历史中的思想遗产？朱光潜先生似乎有感于20世纪中国学习西方的‘科学’社会理论，不仅是‘歪嘴和尚念经’，而且使中国思想界瘫痪到不能思想，也不再会思想的地步。怎么办？只有正本清源，从人文学科自我意识抬头的时候开始，来重新恢复思想能力，从新认识过去自以为已经认识了的东西。朱先生晚年翻译维柯《新科学》的心情是怎样的？朱先生，您毕生呕心沥血，为中国有心向西方学习的后人留下了七百万字著述；在最后乘鹤西行前，您最担心的是什么？能让我们多知道一点吗？”⁽⁴⁹⁾今天看来，赵复三从世界思想史和中国思想界的现状对朱光潜翻译《新科学》的初衷所做的“以意逆志”恐不无道理。如果说“正是朱光潜在美学视野中对维柯的发现和解读，维柯与汉语的相遇才并不外在于当代中国思想，而是作为新时期初‘美学热’的一次事件，深入地参与了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的变革”⁽⁵⁰⁾，那么朱光潜选择维柯《新科学》作为他人生的最后历程的工作，就不仅仅是为了他的美学生涯曾经的“断裂”而采取的“缝合”⁽⁵¹⁾，可能还有更深刻的原因。

维柯出生前近70年，布鲁诺在罗马被教廷处以火刑；过了30余年，伽利略被教廷判决；维柯出生以后直至他去世之后100多年，西班牙和意大利始终被罗马教廷的宗教恐怖统治所笼罩。弗里德里希·希尔曾说：“卡庇曾就意大利之世界的处境写道：‘在意大利不乏真诚、博学、坚持真理、为宣扬真理而献身的人，但他们既不能写作，又不能出版。’‘每个人都被迫带上一个面具，因为在意大利，若不戴面具便不能生存。’因此，弗里德里希·希尔认为，‘维柯在这个时期的发展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维柯可能是泛约阿金思想到德国唯心主义之间最重要的中介，至于思想的传播则是通过他的历史神学。维柯的精神是一股秘密的火焰。他的激情在当时那阴暗的、受限制的环境中更加炽热发光’⁽⁵²⁾。曾经温暖过朱光潜青春情怀的这股炽热发光的‘秘密的火焰’有可能再次照亮过‘年在桑榆间’的朱光潜吗？

晚年的朱光潜，最关心的是什么？或者像赵复三所说，最担心的是什么？这是我们探讨朱光潜晚年维柯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亲身经历“文革”时代的美学老人，在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离开他一辈子为之追求但尚未实现的自由、民主、平等的理想社会时，最担心的可能还是历史悲剧和民族灾难的重演。朱光潜在《新科学》第1078段之后有一个注释说：“在1078段里维

柯鲜明地表示出他对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向往和对贵族统治的厌恨。(维柯)所提到的叙拉古斯岛的第安是柏拉图的好友,柏拉图为着要实现他的理想国,曾两次到叙拉古斯岛去见第安,第安企图在这小岛上恢复贵族统治,人民就把他杀了。毕达哥拉斯的门徒们也在大希腊图谋恢复贵族统治,也被人民杀掉或烧死了。”⁽⁵³⁾朱光潜之所以要这样详细地注解并表明他对维柯反对贵族统治、主张人民民主、自由、平等的赞同,其原因正在于自由、民主、平等是朱光潜一生为之奋斗和不懈追求的理想目标。

抗战时期,朱光潜在四川大后方为拯救民族危难,以自己的才学培养抗战人才,为的就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的新国家。他反对国民党对高校的独裁统治,愤然辞去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一职。在乐山武汉大学教务长的岗位上,他曾为有学生共产党员参加的“岷江读书社”的刊物和《燎原》等墙报题词⁽⁵⁴⁾,并与周扬联系,准备去延安。1944年4月9日,他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宪政促进与言论自由》,反对国民党的“一言堂”,主张人民在国家里要有“说话的地位”,认为“一个民族能在思想言论与行动上活跃,就见得他们的蓬蓬勃勃的朝气。这股朝气是不应遏止的”,“政府的首领须有诤臣诤友上补衮阙,下宣民情”;“人民如果不能自由说话,一切贪污腐败的情形便隐藏在黑暗中,便在黑暗中滋长繁衍”。⁽⁵⁵⁾为了促进国民养成“现代公民常识”,以利抗战,他还举出包括《资本论》在内的中外经典作为新国民的必读书目。⁽⁵⁶⁾抗战胜利后,朱光潜猛烈地抨击国民党“行宪”之后的派系斗争,认为“他们的党侣却大半是贪污无能的”,“一切改革的关键无疑地仍在最高当局”⁽⁵⁷⁾。他坚决反对“以空招牌的民主,促成政府的软弱无能”。他认为,“在目前的矛盾情形下,他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完成他们的职责,就是捐除派系和私人的利害谋算与恩怨关系,以挽救危亡为唯一的共同的目标。民主才上第一课。我们希望他们树立一个良好的风范,不要让人民对民主根本怀疑”⁽⁵⁸⁾。他也会寄希望于国民党的改造,认为“一个政党的成败基于全国人民的信任与否。人民是最讲实际的;他们对于一个政党是否信仰,就要看它能否真正为一般人民谋福利”⁽⁵⁹⁾。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自觉接受思想改造,为的也是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的新中国。80年代初,他不止一次提到,要解放思想,打破思想和学术的禁区。朱光潜有关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言论振聋发聩,表现

出一个真正的学者的人文情怀和历史担当。

历史是一面镜子。了解了朱光潜曾经对自由、民主、平等的理想社会的追求和面对国民党独裁统治所进行的抗争,我们就不难理解朱光潜在评价维柯美学思想的时候,呼吁学术研究要为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决拿出自己的智慧和做出自己贡献的良苦用心。同时也就更容易理解,主张民主合理的君主制,强调人类的历史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强调人的“内心语言”(认识)与外在世界相统一的维柯的思想,就不仅是朱光潜“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的哲学基础,而且也是他一生坚持的政治理想和为之奋斗的人生目标的来源。

如果这就是朱光潜在垂暮之年克服种种困难和外界干扰翻译《新科学》的原因,或者说是他的“担心”的话,那么从朱光潜晚年的维柯研究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两点启示。

一是维柯的美学思想很难用“艺术哲学”来概括。《新科学》是文艺复兴以来区分“人类史同自然史”的总结⁽⁶⁰⁾,也是对以形象思维为主的审美意识与以抽象思维为主的哲学意识进行区分的一部美学名著。从中可以看出,美学在它诞生之初,实际上是一种“人文之学”。这种“人文之学”的理论植根于各个民族自己的文化起源、发展、变化、交流的深厚土壤之中。朱光潜用中国古代的经学、小学、史学、文学、艺术,乃至宗教信仰、礼仪制度、风俗习惯、民间文艺来注解《新科学》,在帮助我们读懂弄通《新科学》的同时,其实反过来证明了中国古代美学的博大精深。在《中国古代美学简介》中,朱光潜谈到中国古代的书法、绘画、佛教、道教、巫术、诗词歌赋,以及生产技术(《考工记》《畴人传》)中的美学观点和美学思想。他特别提到敦煌的莫高窟、安阳殷墟、陕西半坡村、湖南马王堆以及“不断地发现远比敦煌的收藏更古老也许更珍贵的文物”中的美学观念和思想。今天的事实已经证明朱光潜预言的科学性:以莫高窟、安阳殷墟、陕西半坡村、湖南马王堆,以及三星堆、郭店楚简、上博简、清华简、海昏侯墓、燕然山铭为代表的出土文物中的美学观念和美学思想的研究大有人在。我们虽然没有直接的材料证明朱光潜写于1981年的这篇文章来自他的《新科学》的翻译,但从他在《新科学》译注中所使用到的,与他这篇文章同样的中国古代美学资料来看,朱光潜对维柯以人文学科为基础的美学思想的认可,从而反思中国古代美学

的独特性及其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应该还是比较明显的。这种联系给我们进一步的启示是,即使是在当前,《新科学》之于“美学”学科的诞生及其对中国美学的影响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同和阐释,这是不是朱光潜以垂暮之年全译《新科学》的一个原因,或者说是他晚年维柯研究的“担心”呢?

如果这不是朱光潜的担心,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朱光潜晚年最担心的是封建君主专制的余毒还没有被彻底肃清。正如他在翻译《新科学》同时期所写的《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的问题》中所说,“当前文艺界的最大课题就是解放思想,冲破禁区”⁽⁶¹⁾。他说,一想起无数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优秀作家,“谁不痛心疾首!”⁽⁶²⁾“冲破他们所设置的禁区,解放思想,恢复文艺应有的创作自由,现在正是时候了”⁽⁶³⁾。在翻译完《新科学》后所撰写的《维柯的〈新科学〉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论文中,朱光潜在谈到维柯的历史发展观时,还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强调人文科学为国家现实政治服务。他说:“我们目前正处在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阵营角斗的时代,从《新科学》的立场和观点来考虑问题,我们学术界对时局究竟得出什么看法和采取什么立场,倒是刻不容缓的紧急任务。”⁽⁶⁴⁾从这里可以看出,朱光潜晚年似乎有一个美学情结,即中国美学的人文精神尚未得到发掘,为学术而学术或者借学术谋私利的现象使他忧心忡忡。

如果我们再联系到维柯的“障眼法”,即用“异教民族”来回避罗马教廷的残酷迫害,朱光潜翻译《新科学》的原因,或者说他对封建君主专制余毒尚未肃清的担心则不点自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虽然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已经开始,真理标准的讨论也带来哲学社会科学的“春天”,但学术界“乍暖还寒”,20多年来的“左”的流毒并没有被彻底清除。朱光潜一方面感到“憋了十几年的一肚子闷气霎时通畅了”⁽⁶⁵⁾,另一方面又在冷静地观察时局和分析现状,他发现思想意识领域还有不少禁区,不止一次地在翻译《新科学》的同时大声疾呼打破思想学术的禁区。朱光潜对维柯似乎有“了解之同情”,他深知维柯为了躲避天主教会的宗教裁判和恐怖统治,除了以“异教民族”来遮掩他的“各民族的一般性原则”的目标外,有时还不得不恭维和讨好天主教会的良苦用心。⁽⁶⁶⁾朱光潜有一点与维柯很相似,他们都终其一生在大学里为青年一代的道德修养、审美情操和人生境界的完善奉献他们的学识和智慧。维

柯“长期致力于皇家大学的青年教育”⁽⁶⁷⁾。1935年回国后,朱光潜一直在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和武汉大学等高校任教直至人生的终点。他与维柯之间似乎有一种“精神的隔代遗传”,他对《新科学》的翻译和研究可谓维柯的异代知音。

第二个启示是,朱光潜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某些相同看法来证明维柯的观点的正确性,隐含着他对中国美学现状,特别是文风和学风的担忧。他对当时的文风深恶痛绝:“不管读者爱听不爱听,他硬塞给你的就只有这种光秃秃硬邦邦的枯燥货色,连文字也还似通似不通。到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这种文风改变过来呢?”⁽⁶⁸⁾朱光潜大声疾呼:“现在是应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的时候了!”⁽⁶⁹⁾他曾经用“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的老话来苦口婆心地“希望我们的学术走上正轨,大家老老实实地下功夫,说真话,把过去的一些毛病能够改掉”⁽⁷⁰⁾。

正如朱光潜所说,在他所有的著作中,他最看重的还是《诗论》。朱光潜虽然接受的是西方美学的学术训练,但早年的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积累和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掌握,使他能够打通中外,兼修古今,从而建立起自己融西方美学与中国古代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三位一体”的美学体系,而这个体系具有博大的人文主义精神。朱光潜美学思想的人文主义精神的源头一个是中国古代美学的人文关怀精神,一个是维柯所代表的西方人文主义精神。如同维柯当年对世界各民族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原则的思考一样,朱光潜翻译《新科学》,除了传播维柯所阐明的人类进步的人文主义精神以外,可能还有他对中西美学的“共同性原则”的思考。有人指出,朱光潜的外国美学名著的翻译与他的“美学思想的发展是惊人地相吻合的。……借着翻译一隅构建起一座令人景仰的桥梁。问题还不止于此。更重要的还在于:朱先生对大量西方美学名著的翻译,作为他全部美学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我国现代美学的建设和发展具有无可估量的作用”⁽⁷¹⁾。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我们似乎还可以加上一句,朱光潜的外国美学名著的译注,特别是《新科学》的译注也为中国当代美学建构起一座通向西方美学和中国古代美学研究的桥梁,对当代中国实践论美学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进入21世纪,当代中国美学面临着更为复杂和变幻不已的文化学术环境。哲学思想、文学理论、美学理

论、艺术体系及其学说如万花筒般变幻莫测,各种各样的审美实践活动,特别是人工智能引起的新的审美体验和“互联网+金融”行为引起的社会审美意识的嬗变,给中国美学理论的发展和新建带来猛烈的挑战。各种学派的思想、各种流派的学说正蜂拥而至,在中国美学平台上做“主题报告”。经典马克思主义美学还没有将其文本释读彻底,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著作和学说又被系统翻译和引进,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正在被建构;阐释学理论本身还有待进一步阐释,“反对阐释”和“强制阐释”以及“中国阐释学”等新兴理论又接踵而至。由“国学”热催生出来的“新”的中国古代美学研究正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无论是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诗学、宋明理学,还是宗教学、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艺术学、语言学领域里的美学研究,甚至科技、地理学领域的美学研究,或者是将“身体美学”嫁接到中国美学的“身体”之上,将“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移植到中国美学的土壤之中,以及有关中西方美学、美育的通史性研究和各个艺术门类的专题研究,似乎都在努力打通中西、纵贯古今,以求得中国美学的凤凰涅槃。

但是,真正像《新科学》和《诗论》那样的汉译与著作的问世恐怕还有待时日,真正像朱光潜那样将西方美学通过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美学结合得如此科学、如此自然的美学家还有待时代的孕育。因此,我们是不是应该提出“回到朱光潜”呢?如果去除掉朱光潜美学思想上的某些时代色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朱光潜晚年集《新科学》翻译、译注和评价为一体的维柯研究实际上已经将他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呈现出来,即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移西方美学之花接中国儒家传统之木”,在西方美学中发现和反思中国美学,将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过的西方美学思想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融冶一体,创建中国的美学理论,这既是朱光潜一生追求的目标,也是朱光潜晚年维柯研究给我们的最大的启示。

四

已有的对朱光潜维柯研究的评价几乎都充分肯定朱光潜 60 年代和 80 年代的变化,认为“在 20 世纪 80 年代翻译了其著作《新科学》以后,(朱光潜对维柯的)理解更为深入”⁽⁷²⁾。“比较客观而实事求是探讨其思想体系”⁽⁷³⁾。有人甚至说,朱光潜通过前后 10 多年的

思考和探索,对克罗齐的美学思想有了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批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找到了自己的答案”⁽⁷⁴⁾。但朱光潜并不是直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找到研究克罗齐美学的“自己的答案”,而是通过对维柯给予马克思、歌德、赫尔德、黑格尔的影响来完成的。或者说,通过维柯对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与德国古典美学的人文精神的影响,朱光潜寻找到了他倾其一生为之呕心沥血的美学研究的答案,在始于克罗齐、终于维柯的美学生涯中,朱光潜找到了人生真正的归宿。

《新科学》发表已近 300 年,近 300 年来,维柯的思想给人类思想和思想史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我们怎么估量这种影响也不为过。时至今日,马克·里拉等人甚至将维柯看成是“反启蒙”或“反现代”的思想家,⁽⁷⁵⁾说明维柯的思想仍然常青。我们只要看看受维柯影响的歌德、赫尔德、文德尔邦、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霍布斯、夏夫兹博里、柯尔律治、乔伊斯(J. Joyce)、黑格尔、康德、马克思、托洛茨基、克罗齐、科林伍德(Collingwood)、韦伯(W.E. Weber)这一长串名单就足以感到维柯思想的魅力,其中的每一位思想家无不具有人文主义精神。而人文主义精神的缺失已经使中国的美学研究离维柯,离朱光潜越来越远。回到朱光潜,重新认识维柯《新科学》“人文科学”的意义和价值,对当代中国美学研究来说恐怕不是多余的话。

歌德曾赞誉维柯的《新科学》“包含着女仙式的预言,预见到今后将会或应该实现的美好公正的世界,这些预言是以生活和传统的深思熟虑为根据的。一个民族有这样一位老父亲(altervater),真是一件幸事”⁽⁷⁶⁾。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至 80 年代中期,朱光潜终其一生对维柯的《新科学》倾注大量的心血进行如此长期、执着而深刻的研究,特别是晚年对《新科学》的译介,给中国现代美学留下了崇高的人格精神和丰厚的学术遗产。借用歌德的话来说,中国美学有这样一位伟大而睿智的美学家,真是中国美学的“一件幸事”。历史给我们留下了朱光潜的学术遗产和人文主义精神,也留下了他的担心:我们这个世界能否会或应该实现美好公正的世界?这是朱光潜的“担心”吗?

注释: -----

(1)(2)朱光潜:《略谈维柯对美学界的影响》,见朱光潜、黄药眠、常任侠:《美学和中国美术史》,知识出版社,1984 年

- 版,第5页,第6页。
- (3)(7)(8)(64)(76)《朱光潜全集》第10卷《维柯的〈新科学〉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717页,第720页,第683-686页,第695页,第712页。
- (4)(6)《朱光潜全集》第10卷《维柯的〈新科学〉简介》,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81页,第584-585页。
- (5)朱光潜通过马克思给拉萨尔的信、《资本论》的脚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拉布里阿拉(A.Labriola)和马克思女婿拉法格等人的文章论证了维柯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第10卷《维柯的〈新科学〉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第716-717页。
- (9)(10)(11)(12)(13)(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43)(44)(53)(67)[意大利]维柯著:《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5-146页,第87页,第105页,第446-447页,第627页,第437-438页,第441页,第452页,第453页,第359页,第434页,第486页,第528页,第424页,第355页,第543页、第273页,第556页,第381页,第406页,第358页,第428页,第429页,第621页,第628页,第42页,第215页,第558页,第669页。
- (14)朱光潜:《美学拾穗集·黑格尔的〈美学〉译后记》,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44页。
- (15)(16)[德]黑格尔:《美学》第二卷,朱光潜译,1979年版,第19页注②,第127页注①。
- (17)就所涉及的学科看,维柯的《新科学》颇似中国古代的“杂家”类著作。班固说,“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42页)。杂家著作往往是一个历史朝代治国高峰期出现之前的思想准备,《吕氏春秋》之于秦始皇王朝,《淮南子》之于汉武帝的大一统即是明证。就这个意义上讲,维柯的《新科学》即使不是世界现代思想史的开端,至少也是欧洲古典美学人文精神高峰期的准备。
- (37)颜林海:《翻译认知心理学》,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
- (38)许理和说:“在公元4世纪以前似乎还没有中国人知道任何梵语知识。因此,这些学说为中国僧人所接受仅仅是:一方面通过随意的、脱漏的和经常是几乎无法理解的译文这种改变了原样的中介,一方面通过因使用中国术语而增加的误导,而这些术语已经有了确定的哲学涵义并因而拥有了广泛的非佛教意蕴。[荷兰]许里和著:《佛教征服中国》,李四龙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 (39)王国维说,佛教传进之时,为“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一卷《论近年之学术界》,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页。
- (40)王德胜:《20世纪中国美学:问题与个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1页。
- (41)《朱光潜全集》第9卷《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页。
- (42)《朱光潜全集》第10卷《中国古代美学简介》,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54页。
- (43)《美学拾穗集·缘起》,第2页。朱光潜晚年有很多社会活动需要参加,翻译《新科学》时,“年老体衰而杂扰又多,不能专心致志”。第10卷《维柯的〈新科学〉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第717页。
- (46)朱式蓉等认为:“本能地鄙薄翻译而始终又无法漠视翻译,这是现代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奇异现象。这应从具体的历史条件中去寻找答案,对于那些试图冲破因袭的封建旧文艺而积极创建民主新文艺的人来说,崇尚创造而又离不开外域文化滋养,似乎是唯一的选择。”朱式蓉、许道明著:《朱光潜——从迷途到通径》,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7页。
- (47)高金岭:《论朱光潜对西方美学的翻译与引进》,山东大学2005年文艺学专业博士论文。
- (48)朱墨:《朱光潜翻译维柯〈新科学〉的原因、过程与收获》,《学术界》2014年第6期。
- (49)[奥地利]弗里德里希·希尔著:《欧洲思想史》,赵复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16-617页。
- (50)(75)金浪:《维柯的美学读法与新时期的美学热》,《读书》2016年第1期。
- (51)董学文、凌玉建:《“断裂”与“缝合”:维柯〈新科学〉在朱光潜晚年美学生命中的地位与作用》,《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 (52)[奥地利]弗里德里希·希尔:《欧洲思想史》,赵复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8页。
- (54)卢祥麟:《在乐山时期的武汉大学》,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226页。

- (55)《朱光潜全集》第9卷《宪政促进与言论自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175页。
- (56)《朱光潜全集》第9卷《人文方面几类应读的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页。
- (57)《朱光潜全集》第9卷《行宪以后如何？》，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16-417页。
- (58)《朱光潜全集》第9卷《立法院与责任内阁——不要以空招牌的民主，促成政府的软弱无力》，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54页。
- (59)《朱光潜全集》第9卷《国民党的改造》，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20页。
- (60)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注释说，“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同“达尔文注意到的自然工艺史”值得同样注意。“因为，如维柯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9页。
- (61)(62)(63)《美学拾穗集·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第53页，第60页，第61页。
- (65)《美学拾穗集·形象思维：从认识角度和实践角度来看》，第128页。
- (66)维柯在讲到尼柯拉·康西拿神父自己另外构造的一种法律体系时说，“比起过去的三种体系较符合善良的哲学，对人类社会也较有用。他的这一体系是意大利的光荣”。朱光潜注释说：“这位神父在学术上并不著名，因为他是神父，维柯恭维他的话显然在讨好天主教会。”《新科学》，第491页。
- (68)(69)《美学拾穗集·从具体的现实生活出发还是从抽象概念出发》，第47页，第50页。
- (70)《朱光潜全集》第10卷《略谈维柯对美学界的影响》，第670页。
- (71)朱式蓉、许道明著：《朱光潜——从迷途到通径》，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页。
- (72)王攸欣：《朱光潜传》，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66页。

- (73)蒋孔阳、朱立元主编，范明生著：《西方美学通史》第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996页。事实上，朱光潜的维柯研究也因时代的局限存在着某种缺失。例如，朱光潜把维柯“美和魔力就在于这种适合于全民族共同感觉到的一致性”，解释为“偶然露出他对于美的本质和美的标准的见解，一言以蔽之，美就是反映全民族共同理想，因而为全族人民所喜见乐闻的东西”（《西方美学史》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版，第344页），这与维柯自己所说的美的本质就是“整体的和谐”有所不同。但维柯是在分析自然美的时候谈到美的本质的。他认为，“honestas（品德）就有高贵、美和德行这些意义。这三个观念想必就依这样次第诞生的。第一种是‘高贵’，应理解为特属于英雄们的民政的美。第二种‘美’就是自然的美，这是由人用感官会领会的，但是只有那些兼有知觉和领悟的人才知道怎样辨认各部分及其整体的和谐（美的本质就主要在此）”（《新科学》，第280-281页）。在维柯之前，还没有人这样明确地表述过自然美和美的本质。维柯的自然美思想既是对文艺复兴以来对“自然美的发现”（[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马香雪校，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92-293页）的总结，又是对渊源于普罗提诺“整体的美”和奥古斯丁“美源于整一、比例、秩序”以及托马斯·阿奎那“美是由合适的比例构成的”的思想（门罗·C.比厄斯利：《美学史：从古希腊到当代》，高建平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125页，第147页，第159页）的概括。文艺复兴对“人的发现”所带来的对人的外貌的描写、刻画在整体上呈现出来的人体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技术上的准则的确立，哥伯尼、伽利略、布鲁诺等科学家发现的宇宙的“整体和谐”可能都对维柯美的本质就是“整体的和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 (74)张郁乎：《朱光潜前期对康德—克罗齐美学的批评》，《中国文学评论》2018年第2期。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李明彦）